

简论大君外交体制

——以17世纪的日本与中朝交涉为中心

李永春¹, 张晓刚², 杨 华³

(1.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2.大连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3.大连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 日本学者认为, 日本为大君外交体制的中心, 把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夷狄, 要求他们为附属国称臣纳贡, 从而形成了“日本型华夷秩序”。而事实是, 为了打破在东北亚处于孤立境地的不利局面, 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初努力寻找在华夷秩序内的合理定位, 除千方百计接近明朝之外, 还想方设法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在外交交涉失败之后, 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华夷秩序完全成员的客观现实, 被迫自我定位, 构建了所谓“大君外交体制”。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具有很大的虚构性, 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 是必须加以克服的。

关键词: 德川幕府; 大君外交体制; 华夷秩序

中图分类号: K3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95(2012)05-0069-05

收稿日期: 2012-03-15

基金课题: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基金项目(2012lslkztzilsx-02)“互动与影响: 中日韩近代外交与开港”成果

作者简介: 李永春(1972-),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东北亚国际政治和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张晓刚(1962-), 男, 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日本史与中日韩关系史研究。杨华(1977-), 女, 大连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日本语言文化研究。

在日本学术界, 有关德川幕府实行的“大君外交体制”的研究是近世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 出现了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 如中村荣孝、信夫清三郎、荒野泰典等人。持这种观点的日本学者大多认为, 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欧美国要求东亚各国开国时, 在东亚地区大体上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 中国把朝鲜、安南等邻国作为藩属, 形成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 即“华夷秩序”; 日本曾作为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 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 断绝了对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 德川幕府就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关系, 即“大君外交体制”。本文拟就日本学者提出的“大君外交体制”做一简要介绍, 并对其中的一些论点进行评价。

一、大君外交体制简介

日本学者认为, 大君外交体制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种由“大君”所代表的、独立于华夷秩序和西欧国家秩序之外的、日本独自形成的国际秩序,

因当时把幕府外交代表人物——将军称作“大君”而得名。中村荣孝将大君外交体制的内容概括为“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 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 其他一概拒绝”, 而荒野泰典等人则将大君外交体制的对外结构进一步具体化为所谓的“四口说”, 即对虾夷地的松前口、对朝鲜的对马口、对琉球的萨摩口以及对中国和荷兰的长崎口。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 日本在东北亚仍处于孤立状态。因此, 与中国和朝鲜恢复国交不仅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润以充实其财力, 而且也意味着德川政权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面对欧洲势力的动向和复杂的东北亚局势, 家康将朝鲜视为通向中国大陆的一个窗口予以重视。因此, 倭乱结束之后, 家康以对马岛主宗义智为中介人, 向朝鲜传达讲和之意。对马藩一开始就非常积极地在幕府和朝鲜之间进行斡旋, 希望能早日实现国交正常化。这是因为, “很久以来, 对马藩与朝鲜有特殊关系, 靠同朝鲜进行朝贡贸易所获盈利和朝鲜国王赐予的岁遣米

勉强维持自己的财政。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断绝了这一收入来源,对于对马藩来说,复交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面对日方的讲和要求,朝鲜政府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议和派得到国王宣祖的支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朝鲜决定与日本议和,但作为复交前提,提出了两个条件,即家康“先为致书”以及“缚送犯陵贼”。这两个条件在当时朝日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即在当时尚未开始议和的情形之下,日方执政者首先向朝方致国书意味着日方的屈服,而“缚送犯陵贼”则意味着对侵犯朝鲜的侵略行径的惩罚。因此,对于这种要求,幕府是决不可能同意的。为了早日促成讲和以重开贸易,作为中介人的对马藩伪造了一份日本国王的国书,并缚送两个犯人谎称是犯陵贼。由于对马藩的诡计,朝鲜政府于1607年向日本派遣了信史,而使团的名称并不是“通信使”,而是取对德川将军国书的回信以及刷还被劫持的朝鲜人之意,定为“回答兼刷还使”。由此,因壬辰倭乱曾一度中断的朝日关系得以恢复。但是,由于朝鲜派出的只是兼具双重使命的回答兼刷还使,而不是标志着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和平使节——通信使,两国关系实际上还未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

虽然幕府与朝鲜复交,但对于同明朝复交并未立见成效。于是,幕府采取的第二步策略就是通过琉球修好来接触明朝。在壬辰倭乱时期,琉球国王拒绝丰臣秀吉征收军粮,从此与日本断绝了关系。德川家康要求琉球国王前来进贡,并为日明复交作中介人,但再次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于是,在与朝鲜缔结《己酉条约》的1609年,德川家康准许萨摩藩主岛津氏征伐琉球。岛津氏用武力征服了琉球,琉球的中山王成为岛津氏的家臣。为了从对明贸易中牟取利润,萨摩藩命令琉球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册封关系,用萨摩藩的资金进行朝贡贸易。琉球虽然成了萨摩藩的“附庸”,但在它与日本整体的关系上,幕府则按“异国”对待,规定对“异国”琉球的关系与日朝关系一样,即为一种具有正式邦交意义的“通交”关系。在这种虚有其表的地位上,琉球国王照例每当幕府将军袭职时向江户派庆贺使,每当琉球国王袭封时则向江户派谢恩使,谒见将军。但是由于明朝的坚拒,幕府欲通过琉球与明朝复交的计划告失败。

1619年明朝浙江总督照会德川幕府之后,日本

对明交涉再无进展。重返华夷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日本无法获得明政府的册封,导致日本在开展东亚外交时,面临极被动的局面。日本不得不转而谋求新的外交礼仪名分,这成了德川幕府构建新外交格局的起点。1629年“平辽通贡”交涉的失败加速了日本改革对朝外交体制的步伐。1631年日本发生了所谓“柳川一件”事件。事件的处理结果,导致柳川氏被彻底剥夺了在对朝交涉权限。1636年3月14日德川家光召见宗义成,责令其在1636年请来朝鲜通信使,同时指示将事件的处理结果通报朝鲜,表明今后的对朝外交由对马藩全权负责。与此同时,幕府通过由京都五山禅僧轮驻对马藩以酌庵掌管外交文书的“以酌庵轮番制”强化监管,从而直接介入对马藩的对朝外交。幕府在解决该事件的过程中不仅解决了日朝外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着手建立适合于自己的外交方式——大君外交体制。

1636年2月,幕府正式请求朝鲜派遣通信使。在对马藩主宗义成致朝鲜礼曹的文书中,首次正式起用“大君”称号指称将军,请求朝鲜遣使祝贺泰平。朝鲜接受日本称德川将军为“大君”的立场,同意派遣国使满足其“望我邻好之谊”的愿望。1636年8月,以任统为正使、金世濂为副使、成员达475人的庞大使团从汉城(今天的首尔)起程,这是朝日两国复交后第一个冠以“通信使”之名的朝鲜使团,标志着朝日关系已全面恢复到壬辰倭乱之前的交邻状态。使团携带的国书中称将军为大君,这表明朝鲜“对日本改称将军为‘大君’的正式认可,实际上是确认了日本已不再是华夷秩序的完全成员”,意味着德川幕府新的外交方式——大君外交体制的确立。

大君外交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德川幕府承认家康以来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即日明复交失败的现实,转而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幕府陆续实施并加强海禁政策和贸易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荷兰人获准在长崎的出岛设立商馆,并为了“觐见答谢”准许贸易,前往江户谒见将军,这种觐见从1611年开始,1633年后每年进行,从1790年开始则改为每五年一次;自1643年和1644年琉球国王分别向江户派遣庆贺使和谢恩使之后,也成为一种定例。这些使节与朝鲜通信使一同,成为幕府向内外夸耀其拥有诸国前来“入贡”的权威的一种工具。德川将军就是通过这些仪式向国内外显示自己才是掌握日本外交权和统治权的实权者。由于明朝拒绝

了幕府复交的要求，日中未能建立起幕府所希望的“通信”关系。但是，幕府允许“唐船”来往，承认“通商”关系。唐船的来往，不仅可以输入幕府所需的各种产品，而且也可以获取重要的情报。

大君外交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是所谓的“日本型华夷意识”。这种意识可分为国家意识和文化意识：在国家意识上，日本一直视朝鲜为日本曾经统治过的国家，一向认为朝鲜对日本称臣纳贡是理所应当之事。而华夷秩序下的封贡关系的政治意味，也早已为深受“华夷意识”影响的日本所接受。从而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把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夷狄，要求他们作为附属国称臣纳贡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这种华夷观念在林罗山草拟的“致福建总督书”和“致阿妈港（今天的澳门）知府书”中就有充分的表述；在文化意识上，日本人也承认中华思想的文化价值（如汉文和礼仪），这使得朝鲜通信使访日时与日本儒学家的笔谈、唱和以及部分日本朱子学者对朝鲜朱子学者的尊崇成为可能。在这一方面，参与幕府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林罗山、新井白石等人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林罗山、新井白石等人在国家意识方面又对朝鲜怀有蔑视感，这是他们对于文化上比自己发达的朝鲜的自卑感，因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和对抗意识。此外，华夷观念的“自我中心性和文化优越感”（荒野泰典语）对于一直被中华视之为夷狄的日本有着强烈的冲击，“明清鼎革”之际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变动，使很多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学者甚至认为“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终保南隅，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而江户幕府在建立之初，面对如何构筑幕府体制的重要课题，在建设其内部架构的同时，也势必为其国际地位谋划经纬，为其统治寻求基于某种国际关系之下的法统支持。试图复归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江户幕府仍关注着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化，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明清更迭所带来的所谓‘华夷秩序’变异及其连锁反应上，并有意地夸大了这一反应”。“华夷态势”的所谓“逆转”和本土“中华”的所谓“消亡”，促使日本“中华观念”意识不断膨胀，甚至罔顾事实，认为自己可以居于某种华夷秩序的顶点。但是，单纯以“日本型华夷观念”作为“日本型华夷秩序”存在的证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大君外交体制评价

日本学者大多认为大君外交体制的确立是日本对外关系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大君外交体制给予高度评价，但依笔者所见，还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商榷。

第一，大君外交体制的建立具有很大的虚构性。在论述大君外交体制时，日本学者经常引用的一个史料就是1610年由林罗山草拟、以德川家康的执政本多正纯的名义致福建总督的书信，信中称“方今吾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中略）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贡，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日本学者以此为依据，主观地设计出所谓的“椭圆形华夷世界结构”，这种结构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作为另一个华夷秩序的中心，把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夷狄，要求他们作为附属国称臣纳贡，从而形成了“日本型华夷秩序”。这种观点严重脱离史实，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当时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下平等的敌礼关系，所谓“朝鲜入贡”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无稽之谈。在德川时代，日本人对朝鲜的认识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形态：一方面非常尊崇朝鲜文化，每次朝鲜通信使访日，都在日本引起轰动。通信使不仅是朝鲜的外交使节，同时又是文化的交流者和传播者。使团成员除了官员以外，相当数量是朝鲜著名的学者、诗画名家。他们到达江户完成外交任务之后，就与日本国内的文人、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不少日本人把朝鲜视为文化上的先进国家而予以尊重。另一方面，日本则对朝鲜持有优越感甚至蔑视感。这源于一些日本人对朝鲜的传统认识，即认为日本曾经统治过朝鲜（即所谓“神功皇后征韩论”），加之壬辰战争中军事上的优越意识，因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朝鲜的优越感，这实际是从文化上的自卑感衍生出的对抗意识。其次，所谓“安南、交趾、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贡”也与史实不符。在1601年至1610年间，安南等国均与日本保持着一定的外交文书往来和通商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都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的，并不存在附属国对宗主国的“上书输贡”。而事实是，德川家康为了打破因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导致的孤立局面，积极谋求展开对东南亚诸国的外交，告示德川幕府的统治，

索取东南亚的特产以夸耀幕府的权威，并推进幕府垄断的朱印船贸易；而东南亚诸国与日本交往的目的主要是获取日本的武器，并要求日本加强贸易管理。此外，说“西洋”国家向日本“上书输贡”也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以大君外交体制中规定的“通商之国”荷兰为例，在幕府颁布锁国令之后，成为欧洲国家在日本的唯一代表。荷兰商馆馆长按照幕府的规定每隔一定时期前往江户谒见将军，以答谢准许贸易。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误认为荷兰与日本之间形成了宗藩关系而加入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因为荷兰与幕府的关系，只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幕府的关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岛兰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并不是荷兰国家的代表机构，前往江户“谒见”将军的“甲比丹”也只是为贸易问题前来道谢的荷兰商馆馆长，并不是携带国书的国家使节。幕府与荷兰保持这种关系是有其目的，其一为获取贸易利益，其二为获取海外情报。可见，幕府与荷兰之间并不存在“上书输贡”之事，这完全是幕府为了向国内外炫耀自己的权威而处心积虑演出的一出戏。

第二，日本学者大多将“柳川一件”视为德川幕府建立“大君外交体制”的契机甚至是近世日朝关系的转折点而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在大君外交体制建立过程中，德川幕府在外交上表现出主动性和灵活性，而朝鲜的外交则始终处于接受幕府所提要求的被动地位。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日朝两国的外交关系确实是呈现出日本提出要求而朝鲜最终接受这些要求的现象。而实际上，朝鲜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幕府的要求。在处理因“柳川一件”而产生的事关朝日关系的重大问题时，朝鲜政府做出了积极而灵活的反应。该事件发生后，朝鲜迅速取得有关情报，“调兴与义成嫌隙渐成，调兴使密传书中，亦有凶言涉于我国云”，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岛主、调兴方相倾陷，此时送译恐妨于两间嫌疑，且彼若留置鰲浦，则不免空还，有辱国之患”，从而果断中止因贸易问题即将派遣的译官。但朝鲜并不只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谋求了解事件的真相及局势的进展。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朝鲜派出译使吊慰，首开德川将军去世派遣译使行吊礼的先例并形成定制；1634年底应宗义成之请决定派遣“马上才（表演杂技的艺人）”赴日并于翌年正月令译官洪喜男和崔义吉率领出发，以侦探日本的情报。1635年7月，朝鲜

译官和“马上才”归国，朝鲜政府随即依据从日本收集的情报对日本的局势进行评估以筹划对策。仁祖否决了司宪府和司谏院“倭情可忧”的看法，认为日本不会对朝鲜构成威胁，是可以和平相处的。朝鲜对德川幕府的这种评价为幕府实施外交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客观的外部环境。

这一时期，朝鲜对日外交呈献出积极主动也与当时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有关。在中国东北，女真人迅速崛起、势不可挡，朝鲜两面受压、处境尴尬。1627年1月后金三万大军入侵朝鲜，强迫朝鲜缔结“兄弟之盟”，史称“丁卯胡乱”。2月8日，备边司上疏提议将该事通报日本，仁祖准许。东莱府使柳大华于1627年2月27日将书契送至对马岛主处，而朝鲜向明朝兵部通报此事是3月9日。由于缺乏史料，朝鲜先向日本通报兵乱的原因无从得知，但可能是希望借此稳定朝日关系，以避免腹背受敌的窘境。幕府对于大陆局势的变化甚为关注，一方面通过对马藩“委送差倭，又送军器”，以示对朝鲜的支持，另一方面提出“平辽通贡”的问题。1629年1月，幕府派出以规伯玄方为正使、平智广为副使的代表团前往朝鲜。朝鲜经过激烈的廷议，在壬辰倭乱之后首次允许日本使节进京，但拒绝了德川幕府的“平辽通贡”计划，日本使节只得无功而返。可见，朝鲜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也充分考虑到周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适时调整外交政策，以确保本国的利益不受损害或尽量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不像某些日本学者所说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打破在东北亚处于孤立境地的不利局面，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初努力寻找在华夷秩序内的合理定位，除千方百计接近明朝之外，还想方设法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在“假道通贡”和“平辽通贡”交涉失败之后，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华夷秩序完全成员的客观现实，被迫自我定位，构建了所谓“大君外交体制”，经过日朝两国艰难交涉，终被朝鲜所承认。有关大君外交体制的研究成为日本学界的热点，日本学者的许多开拓性分析不乏启发性，无论是对东亚国家的学者还是欧美国家的学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些成果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逻辑错误，其观点非常模糊，

其理论依据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是必须加以克服的。

参考文献：

- [1] [日]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研究:下卷[M].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465.
- [2] [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亚洲中的日本史[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纸屋敦之.大君外交与东亚[M].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552.
- [3]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20.
- [4] [日]中村荣孝.日本与朝鲜[M].东京:至文堂,1966:20.
- [5]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214.
- [6] 陈文寿.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M].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408.
- [7]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216.
- [8]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56-60.
- [9] [日]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
- [10] 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2008(1):50.
- [11] [日]林罗山文集,十二,外国书,上.
- [12] [日]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56-60.
- [13] [日]中村荣孝.日本与朝鲜[M].东京:至文堂,1966:218. 东莱府接倭事目抄.辛未九月条. 朝鲜通交大纪卷七. 宽永九年条. 边例集要卷十八. 使臣. 仁祖实录卷十五. 仁祖五年二月. 乙巳.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Tycoon” Diplomatic System

LI Yong-chun¹, ZHANG Xiao-gang², YANG Hua³

- (1. CASS Institute of Asian-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y, Beijing 100007,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3. Japanese college of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Abstract: Some Japan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Japanese “Tycoon” diplomatic system was a unique international order established by Tokugawa Shogunate and represented by “Tycoon”, independent of the traditional “Sino-centric Sphere Order” (tributary system) and the nation-state order in Western Europe. Japan was the center of “Tycoon” diplomatic system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must render tribute to it as “barbarians” and tributary states, thus forming a “Japanese tributary system”. However,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viewpoint is fictional and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historical truth is: in order to break unfavorable and isolated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okugawa Shogunate tried to find its reasonable position within the “Sino-centric Sphere Order” (tributary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In addition to make every attempt to approach Ming Dynasty, Tokugawa Shogunate also tried to find ways to restor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Korea. After the failure 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Tokugawa Shogunate had to accept the objective reality: it was no longer a full member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It was forced to self-positioning, and established the so-called “Tycoon diplomatic system”.

Key words: Tokugawa Shogunate; Tycoon diplomatic system; Tributary system